

上海“五个中心”新一轮发展战略研究¹

顾 锋 吴文锋 曹永荣 赵一飞 史占中

(上海交通大学 200030)

【摘要】:上海要瞄准“科创为本、金融为纲、经济为目、航运和贸易为两翼”的战略定位,分两个阶段实现打造“三个圈层”的上海大都市圈、建设具有全球领导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叠加建设超级城市的战略目标。为此,要强化科技创新引领、升级科技创新中心,发挥金融联动、推动“五个中心”协调发展,推进国际经济中心向国际数字经济中心转型,推进国际贸易中心向服务化和数字化转型,推进国际航运中心向国际中转型航运中心转型。

【关键词】:五个中心 科技创新 数字经济 新一轮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7.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309(2023)04-0038-010

一、上海“五个中心”新一轮发展的战略意义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开放,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上海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五个中心”新一轮发展将是引领中国“第三次开放”、带领中国迈向世界经济中心的必由之路,对于国家发展战略的意义极为重大。

(一)打造高水平开放、促进更高质量发展的标杆城市

上海“五个中心”新一轮发展,就是通过高水平开放,促进上海构建更高质量发展的标杆城市。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更大的逆风和回头浪。实现高水平开放,有利于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有利于推动转方式、调结构、增动力,有利于培养和壮大新动能,高水平开放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中国将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加速发展,为 global 经济发展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可以说,只有通过高水平开放与全球市场和资源充分链接,才能更好地开发新技术、培育新产业、扶持新业态、打造新模式。

(二)打造区域协调发展的全国样本与一体化发展的先锋示范区

上海和纽约在中美两国有一致的战略地位。对标美国,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经济体量占中国的比例(23.16%),恰如以纽约为龙头的纽约都市圈 GDP 占美国的比例(24%)。长三角区域是全球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也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上海具有无与伦比的经济辐射能力,上海“五个中心”新一轮发展必将把长三角三省一市的优势资源整合、形成合力,形成良好的产业互动和配套,为经济增长保持活力,推动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而辐射国际市场,同时也把世界各国的优势资源引入长三角三省一市,助力长三角再次腾飞。

¹ **作者简介**:顾锋,管理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吴文锋,金融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文科处处长、智库中心主任,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曹永荣,管理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赵一飞,哲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中美物流研究院院长助理。史占中,经济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三) 打造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

上海背靠长江，有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的天然优势。2016年9月，《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印发，并发布了“一轴、两翼、三极、多点”的发展格局，它是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重大国家战略的纲领性文件。长江货物吞吐量约占全国水路运输的92%，而上海独占长江货物吞吐量的10%；上海远洋运输的货物吞吐量约占全国的8.2%；上海民用航空货物吞吐量约占全国的58%。上海在内河水运、沿海和远洋、民用航空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但上海在公路（约占全国的1.1%）和铁路（约占全国的0.1%）方面的枢纽功能相对薄弱。《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明确指出，“上海港码头结构性矛盾突出，铁路与港区、内河港区与海港衔接不畅，高等级内河航道、公路集疏运网络部分区段瓶颈影响整体效益发挥”。上海“五个中心”新一轮发展应补足短板，打造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

(四) 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典范

上海“五个中心”新一轮发展的战略意义，就是按照当好新时代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的要求，解放思想，勇于担当，敢为人先，坚定践行新发展理念，深化改革开放，引领创新驱动，着力在深化自贸试验区改革、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上有新作为，不断增强吸引力、创造力、竞争力，努力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子，加快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二、上海“五个中心”新一轮发展面临的挑战

(一) 缺少区域一体化新动能，面向“双循环”的发展纵深不足

根据《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未来上海将构建与苏州、无锡、南通、宁波、嘉兴、舟山等地区协同发展的上海大都市圈。但与此同时，苏州、宁波和杭州均规划了自己的都市圈，如苏锡常都市圈、宁波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并与上海都市圈有部分重叠。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是各省市的重中之重，上海与浙江、江苏不可避免地存在竞争—合作关系。就长三角各省市GDP占长三角总体比例而言，上海(16.49%)落后于江苏(43.76%)和浙江(27.53%)，略高于安徽(12.22%)。珠三角则基本处于广东的统一行政辖区之下，围绕广州与深圳，佛山、东莞、惠州、中山等珠三角一体化颇为成功。2021年广东4座城市的GDP超万亿元，其中深圳破3万亿元，广州为2.82万亿元，佛山和东莞均超1万亿元。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GDP占整个湾区的81.12%，香港占17.65%，澳门占1.23%，广东在整合粤港澳大湾区方面有巨大优势。而京津冀一体化起步早，国家“十二五”规划就已将其纳入该项战略。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时强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项重大国家战略。此外，上海土地面积较小，发展纵深有限，市域面积仅6340.5平方公里，不仅小于国内其他3个直辖市以及各省会和副省级城市，而且也小于国外的纽约大都市区(1.02万平方公里)、大东京地区(2.1万平方公里)和大巴黎地区(1.2万平方公里)。

(二) “五个中心”系统集成弱，协同发展能力不足

上海面向“五个中心”协同发展能力不足，“五个中心”的内涵、联系逻辑不清楚，同时“五个中心”能级不强，各中心间的交叉协同发展不足，“孤岛现象”突出。2021年《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报告》和《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的数据显示，上海“航运中心”和“金融中心”国际排名靠前，但在航运保险发展中却面临专业人才储备不足、保险公司业务单一、航运保险产品缺乏创新力、航运保险制度相对滞后等问题。经济、航运、贸易、金融、科技创新中心间主次关系、相互联系的逻辑不清晰。根据历史发展规律，前期“五个中心”由“航运驱动”，目前由“金融驱动”，未来将由“科创驱动”。

(三) 科创实力弱，面向国际的话语权、领导力不足

通过对全球100个知名城市在研发创新合作关系的分析，本文绘制出了“全球科创城市网络”(图1)。整个全球科创城市网

络由 1 张主网、3 张辅网和若干小网构成：美国硅谷是“全球科创城市网络”的超级中心；纽约、东京和法兰克福是“全球有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北京、巴黎、伦敦、首尔、慕尼黑是“国家级科创中心”。上海在“全球科创城市网络”中处于第三层级，是隶属于硅谷主网的三级“科创中心”。全球创新城市均以集群(Cluster)方式展开全球竞争，如日本东京—横滨等，但“长三角科技创新一体化”的格局没有完全形成。上海的国际专利申请数比较落后，仅为东京的 1/8、北京的 1/2。同时，缺乏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巨头，如纽约的辉瑞制药、威瑞森电信等，东京的索尼和佳能等，伦敦的 Deepmind 和英国电信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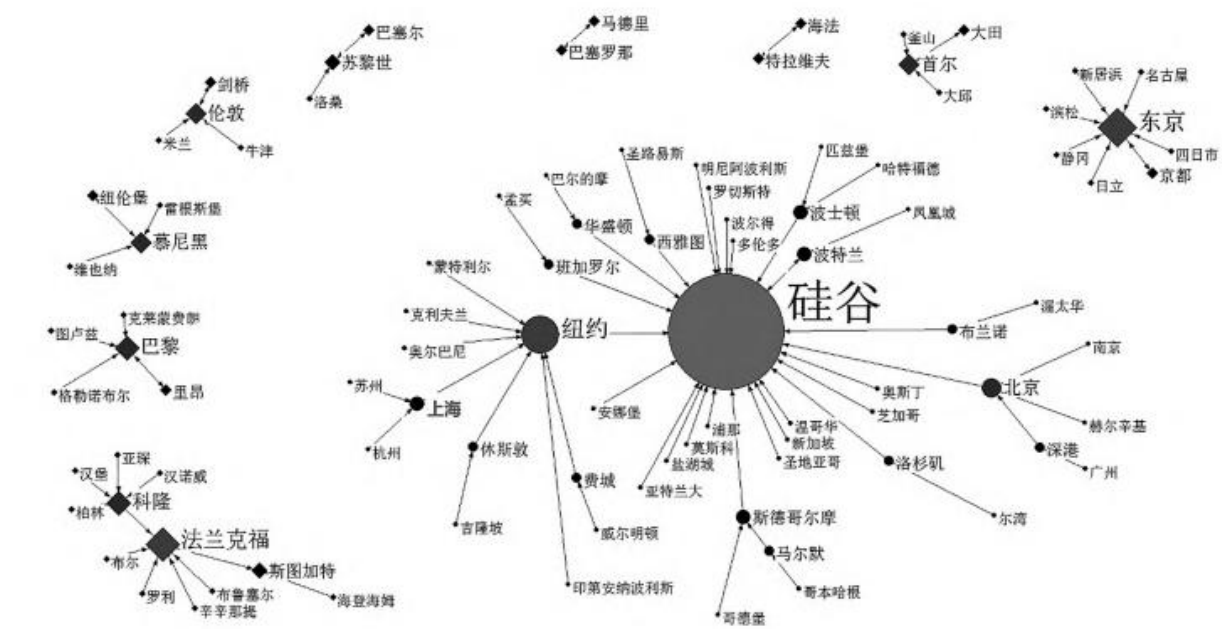


图 1 全球科创城市网络

(四) 先行先试政策不够，面向国际竞争的原动力不足

自 2013 年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以来，上海急需先行先试政策，并与其他全球城市展开竞争。上海作为全球贸易的网络核心优势不明显；服务贸易发展迅速，但结构和能力有待提升；国际贸易的制度环境有待优化。此外，上海还存在市场化程度不高、市场辐射力不足、集聚性国际经营主体缺失等问题。

三、上海“五个中心”新一轮发展的战略思路

(一) 战略定位

战略定位：“科创为本、金融为纲、经济为目、航运和贸易为两翼”。上海应充分利用国内国际市场资源，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一带一路”倡议等，构建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将上海打造成为世界级科技创新城市群的龙头城市(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全球数字经济的新高峰(国际经济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数字城市)、全球供应链的超级枢纽(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人民城市样板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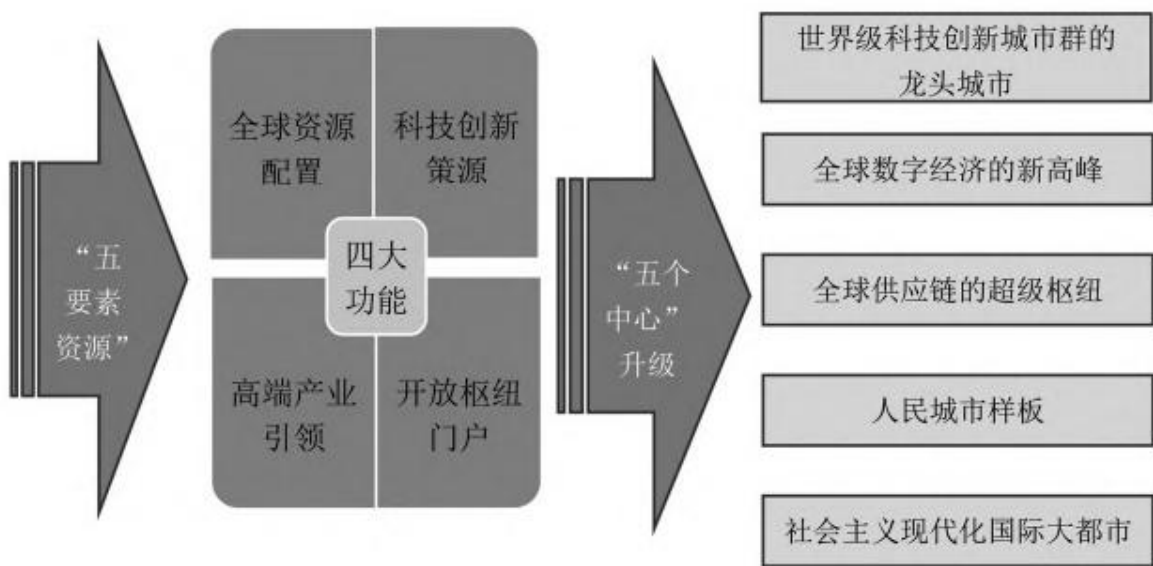


图 2 上海“五个中心”新一轮发展的战略定位

(二) 战略目标

1. 2025 年战略目标

贯彻落实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取得显著成果，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和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功能迈上新台阶，人民城市建设迈出新步伐，谱写出新时代“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新篇章。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取得重大进展，数字经济占 GDP 的比重达 60%。

一是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取得显著成效，对标打造国际一流、国内领先的数字化标杆城市，基本构建起以底座、中枢、平台互联互通的城市数基，经济、生活、治理数字化“三位一体”的城市数体，政府、市场、社会“多元共治”的城市数治为主要内容的城市数字化总体架构，初步实现生产生活全局转变、数据要素全域赋能、理念规则全面重塑的城市数字化转型局面，国际数字之都建设形成基本框架，为 2035 年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数字之都奠定坚实基础。

二是国际贸易中心能级实现跃升，基本建成全球贸易枢纽、亚太投资门户、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亚太供应链管理中心、贸易投资制度创新高地，全面建成国际会展之都，为上海建设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提供重要支撑。

三是形成枢纽门户服务升级、引领辐射能力增强、科技创新驱动有力、资源配置能级提升的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新格局。2025 年，基本建成便捷高效、功能完备、开放融合、绿色智慧、保障有力的世界一流国际航运中心。

四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能级显著提升，服务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作用进一步凸显，人民币金融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中心地位更加巩固，全球资源配置功能明显增强，为到 2035 年建成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奠定坚实基础。

五是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树立全球视野，对标国际领先水平，不断提升上海在世界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中的影响力和竞争力；聚焦科技创新，围绕科技改变生活、推进发展、引领未来，率先走出创新驱动发展的新路；体现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根据国家战略部署，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为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作

出应有的贡献。

2. 2035 年战略目标

一是在“十四五”发展的基础上再奋斗十年，到 2035 年初步打造成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世界级科技创新城市群的龙头城市”“全球数字经济的新高峰”“全球供应链的超级枢纽”“人民城市样板”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数字之都基本建成，届时数字经济占 GDP 的比例将达到 80%。

二是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和文化大都市功能全面升级，基本建成令人向往的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和充分体现中国特色、时代特征、上海特点的人民城市，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的核心引领城市，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重要窗口和城市标杆。

三是世界影响力全面提升，全球枢纽和节点地位更加巩固，城市核心功能大幅跃升，城市软实力全面增强，综合经济实力迈入全球顶尖城市行列。高质量发展率先实现，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

四是“人人都有人生出彩机会、人人都能有序参与治理、人人都能享有品质生活、人人都能切实感受温度、人人都能拥有归属认同”的美好愿景将成为这座城市的生动图景。

四、上海“五个中心”新一轮发展的战略任务

（一）拓空间：打造“三个圈层”的上海都市圈

上海的发展源于三次跨越，跨越苏州河，实现了第一次飞跃；跨越黄浦江，实现了第二次飞跃；跨越长江，必将带来上海的第三次飞跃。上海“五个中心”新一轮发展的首要任务是对标纽约、伦敦、东京和巴黎，秉承“共同富裕”理念，整合“三个圈层”的上海都市圈。

纽约、伦敦、东京和巴黎都市圈有以下两个特点：由核心城区从内向外辐射，并形成“三个圈层”；第一圈层的面积通常比较小，第二圈层通常在 1 万~2 万平方公里，第三圈层则通常在十几万平方公里。作为长江门户和我国的国际航运中心，上海可以从海洋到内陆逐渐构建类似纽约、伦敦、东京和巴黎的都市圈。一是充分发挥长三角一体化的协调发展效应，整合长江出海口的资源，在国际上打造“上海大都市区”概念。例如，以“长江入海口”为主轴，南面有“浦东国际机场”“洋山港”，北面有“上海南通国际机场”“通州港”，上海城市发展将呈现“两翼张开”的局面。届时，上海无与伦比的超级枢纽功能将得到进一步巩固。二是加速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纽约、伦敦、东京和巴黎的区域一体化发展非常成功。尤其是纽约都市圈，它是协同发展的典范。该都市圈最突出的特点是圈内各中心城市之间形成功能互补、错位发展的格局：纽约是首屈一指的国际金融中心，波士顿的高科技产业、费城的国防及航空工业、巴尔的摩的矿产冶炼工业以及华盛顿特区的旅游业始终离不开纽约国际金融中心的辐射作用。孤立地看，每座城市的主导产业都是单一的，但放眼整个都市圈，多样化、综合性的整体功能远远大于单个城市功能的简单叠加，圈内产业分布呈现多元互补的格局。

（二）扩容量：加速向国际中转型航运中心转变

上海港货物吞吐量亟待扩容，并向国际中转型航运中心转变。一是新加坡港地处马六甲海峡东端，被誉为“东方十字路口”，是全球最大的转运中心，也是全球最大的集装箱中转枢纽港之一。2019 年 10 月，新加坡大士港码头举办了动土仪式，该港分 4 阶段建设，规划年吞吐能力 6500 万 TEU（远超上海港）。预计到 2040 年，新加坡将坐拥两大世界级码头，年吞吐量 10500 万 TEU。上海亟须整合资源，以应对来自新加坡的挑战。二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核心港口上海港主要以腹地货源为支撑。面对国际国内“百年未遇之大变局”，助力实现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这一中国经济的首要战略目标，上海港在 2035 年转型为以国际

中转业务为主的国际航运枢纽势在必行。世界中心城市都是自由贸易港，是全球资金、信息、技术、人才、货物等要素资源的关键节点，其核心竞争力包括投资开放、金融开放(投融资)、外贸自由(结算和航运)、自然人流动(人才)等。因此，上海港应建立以开放为核心的制度安排，打造高质量开放示范区。

(三) 抓关键：建设具有全球领导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为推动长三角科创一体化发展，建设具有全球领导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基础上，将上海都市圈打造成“世界级科技创新城市群”，形成“一核(上海)、三廊(沪嘉杭、沪苏湖、沪锡常)、十四城”的科创一体化新格局。自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提出“上海要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的奋斗目标以来，上海在推动创新协同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其中松江依托G60松江段，以其为中轴延伸辐射，发展沪杭沿线产业带，建设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在创新协同实践中走出了一条新路。朝着成为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引擎这个目标，G60科创走廊的发展经历了从1.0版到2.0版，再到如今3.0版的“三级跳”。通过G60科创走廊系列版本的延伸和升级，长三角三省一市在深化产业集群布局、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协同创新、推动品牌园区深度合作和产融结合、综合审批制度改革成果等方面持续发力。G60科创走廊已成为长三角区域的创新协同融合发展平台，对于完善长三角科创一体化空间布局、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引擎作用，并成为推动区域创新协调和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品牌。

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巨头，吸引科技“独角兽”、世界500强科创企业在上海建设总部、研发部门。自1949年以来，上海一直是内地第一的经济大市，但2021年前三季度，北京以10.7%的经济增速领跑一线城市，与上海GDP之比罕见攀升到96.3:100的历史新高点。2021年，重点产业助力北京GDP迈入四万亿元城市行列，以新冠疫苗供应为例，借助于新冠疫苗产能的巨量扩张，北京医药制造业同比增长2.9倍，这让拿下生物医药先进制造业“国家队”产业集群的上海难以企及。此外，北京的互联网企业无论在数量还是在体量方面都位居全国之首，集聚了以字节跳动、京东、小米、百度、美团、新浪为代表的互联网第一梯队企业。在数字经济、5G、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新赛道，北京借助互联网产业和强劲的科研优势，在全国拔得头筹，寒武纪、商汤科技、地平线等一批“独角兽”企业发展势头迅猛。2021年中国互联网百强企业中有34家在北京、16家在上海。

(四) 重协同：战略叠加建设超级城市

“五个中心”之间存在如下关系：其一，由于城市个体在地域、人口等方面的局限性，国际经济中心通常要有广阔的腹地。国际经济中心是建立国际航运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支撑，进而形成强大的国内、区域和全球辐射能力。其二，国际航运中心是集发达的航运市场、丰沛的物流、众多的航线和航班于一体的，以国际贸易、金融、经济中心为依托的国际航运枢纽。其三，国际贸易中心与国际金融中心相互影响、相互支撑、互为前提，为国际金融中心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其四，由于国际科创中心的“慕强性”和“迁徙性”，在“五个中心”中具有最高的优先级；国际经济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国际金融中心 and 国际贸易中心相互成就，具有次优先级。基于此，本文提出“五个中心”升级的“蝴蝶模型”(图3)。在该模型中，国际科创中心为首，对“五个中心”的升级至关重要；国际金融中心为躯干，是连接其他“四个中心”的纽带；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为两翼，是带动“五个中心”升级的原动力；国际经济中心为腹地，是“五个中心”的稳定器和压舱石。上海应基于“五个中心”升级的“蝴蝶模型”，注重“五个中心”的协同发展，通过各种战略叠加，实现建设超级城市的战略目标。在具体举措方面，应由易入难，航运和贸易(两翼)先行、金融和经济(躯腹)支撑、科创(首)大力跟进，最后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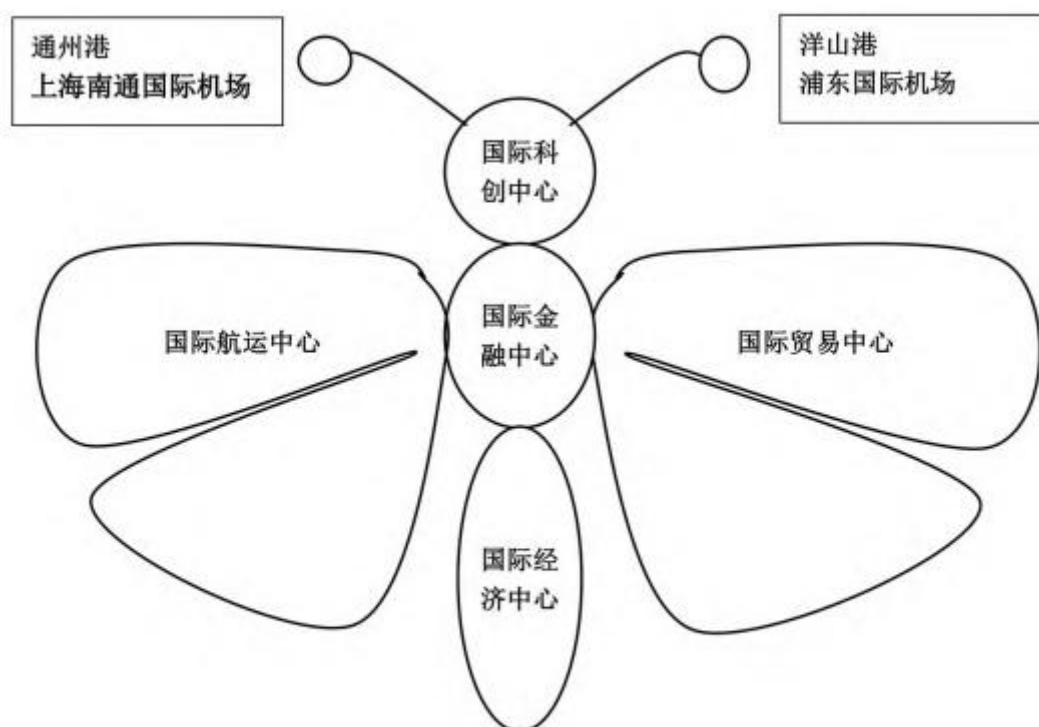


图 3 “五个中心”升级的“蝴蝶模型”

五、上海推进“五个中心”新一轮发展的举措建议

(一) 强化“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的职能

2018 年 11 月 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宣布，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同“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相互配合，完善中国改革开放空间布局。2019 年《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提出“设立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呼之欲出。毋庸置疑，4 个省级单位间的行政壁垒会制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上海都市圈建设。因此，应从职能上进一步强化“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探索打破行政壁垒限制的体制机制，树立同频共振、一体化发展的新理念，着力强化与长三角腹地城市的一体化发展联动，并产生 1+1>2 的正和效应。秉承共同富裕理念，稳步落实《纲要》要求，为上海打开发展空间、增强发展功能做出有益贡献，打造“三个圈层”的上海大都市圈。

(二) 强化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大力升级科技创新中心

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是国家战略需要，也是上海自身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内在要求。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要体现全球影响力，包括创新资源的集聚力、创新成果的影响力、新兴产业的引领力；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向创新要活力、要动力、要效益；要成为中心城市，应具有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和强大的区域创新辐射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关键是立足于国际化和市场化两个战略基点，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一是以国家实验室建设为牵引，推动形成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围绕生物医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以国家实验室为引领，打造高水平基础研究力量；推动国家实

实验室效应扩散辐射，拓展上海科创中心承载区，联结长三角城市，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探索国家实验室的共建共享、开放合作，推动交叉融合、综合集成，集聚和培养科技创新人才。二是加快对重大领域和未来产业的前瞻布局，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关键核心技术。聚焦重大领域，牵头发起国际大科学计划，积极谋划和布局未来产业；推进大科学设施建设，打造高水平研究机构和研究型大学群，设立基础研究特区；加快张江科学城、临港新片区、G60 科创走廊、环高校创新带的建设。三是坚持制度创新，充分激发多元创新主体活力和能力。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充分调动国企、民企和外企三大市场主体的能动性；赋予新型研发机构充分的自主权，推行科技攻关“揭榜挂帅”，激发科学家的创新活力；健全与创新发展相适应的投融资体系。四是坚持产业化发展定律，坚持国际化发展方式，坚持市场化发展路径。

（三）发挥金融联动作用，推动“五个中心”协同发展

国际贸易中心侧重商流、国际金融中心侧重资金流、国际航运中心侧重物流，而信息流的顺畅便利可靠成为国际科创中心发展的主要内容之一，国际经济中心则是上述四个中心的综合体现。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要与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科创中心建设紧密合作、相互渗透。国际金融中心与其他四个中心建设紧密相关，金融+科创中心建设，要把金融有效服务科创企业作为金融中心建设的着力点，在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提供高质量的金融服务，这既能帮助在沪科创企业发展，还能吸引外地科创企业到上海来，从而助力上海国际科创中心建设。金融+航运中心建设，应加快推出航运指数期货等航运衍生品交易，通过金融服务助力航运中心建设。一方面，推动海运领域费用以人民币结算，促进国际金融中心与航运中心建设互动；另一方面，多管齐下，推动国际航运中心与科创中心深度融合创新。

（四）推进国际经济中心向国际数字经济中心转型

随着全球竞争格局的变化和区域一体化深入发展，经济中心城市作为经济社会活动集中地和影响源，在带动增长、产业管控、资源配置、创新引领、开放改革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对于国际经济中心，国际上并无直接的概念表述，对其内涵也未形成共识，与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贸易中心目标在国家重要文件或规划中已有明确表述不同，经济中心没有明确的目标框架。从广义角度理解，国际经济中心包含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功能，是国际经济中心城市发挥资源配置能力和综合服务功能的核心承载；从狭义角度理解，国际经济中心更加侧重城市的综合经济实力和产业经济功能，突出产业经济领域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和控制力、影响力。上海建设成为国际经济中心，不仅是上海自身经济发展的要求，也是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乃至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中国改革开放、适应进入全球化竞争时代的国际经济形势的必然要求。

上海建设国际经济中心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一个可称之为数字经济中心，主要由发展数字经济和第三产业来承担，金融中心、科创中心、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都属于这个范畴；另一个是实体经济中心，是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和区域创新能力为依托的经济中心，是经济实力的集聚。进入新发展阶段，上海面向全球和未来、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一个重要的主攻方向和任务，是在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推进上海国际经济中心综合实力取得新突破，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走在高质量发展的全国前列。同时，要顺应和引领以智能化为标志的世界第四次科技和产业革命潮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五）推进国际贸易中心的服务化和数字化转型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举办，进一步凸显了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在全球贸易中的枢纽地位和长三角区域的贸易龙头地位。在新时代背景下，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要顺应全球贸易主体从制造向服务和数字领域的演变趋势，破解贸易服务和数字服务的制度瓶颈，突出贸易服务能力和数字连接能力，构建覆盖长三角区域、辐射全国的内向贸易网络，拓展面向全球贸易合作伙伴城市的外向贸易网络。一是加强国际会展之都建设，实现上海国际贸易中心能级跃升。例如，全力提升进博会的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着重拓展国际性会展活动，持续放大进博会溢出带动效应，持续提升会展业配置全球资源的能力，精心打造国际化城市会展促进体系。二是以进口为突破口，推动建立覆盖长三角区域的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内向贸易网络，提升上海国际贸易中心

国内国际市场战略链接功能。三是推动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内涵的服务化和数字化。服务化和数字化是提高产业链增加值、提升价值链地位的路径，也是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相较其他城市的短板。上海可依托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建设，提升数字贸易基础设施的便利化水平，推动贸易数字化和数字贸易规模化跃升。四是完善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贸易环境。知识产权保护、环保、劳工等高标准“边境后”规则日益成为全球经贸博弈焦点，上海可加强公平竞争、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等“边境后”经贸规则的探索。

(六) 推进国际航运中心向国际中转型航运中心转变

以国际集装箱“沿海捎带”业务、海运费人民币结算中心、船舶能效交易、邮轮母港突发公共事件理赔保险业务以及集装箱注册登记为抓手，创新国际航运新规则，到2025年形成一批上海试点的在全球航运市场有引领作用的规则规范，提升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全球航运资源配置能力。以大洋山港区、通州湾港区和上海南通机场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以中国电子舱单交换中心、国际海运集装箱注册登记中心为载体，实现江海联运、海铁联运、国际中转业务的协同发展。到2035年，将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打造成为全球领先的智慧低碳的全球航运枢纽和航运供应链数字资产中心。2021年11月18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外资集装箱班轮公司开展大连、天津、青岛以上海洋山港区中转港的国际集装箱“沿海捎带”业务，这是上海港开展国际中转业务的里程碑。上海港应抓住这一机遇顺势而为，积极与交通运输部门和国家口岸监管部门配合，将围绕上海洋山港区的国际中转业务扎实开展起来，争取在2025年取得国际集装箱中转业务新突破。与此同时，在港口布局方面，上海港有必要根据国际中转业务的特点，将各班轮公司重新调整船舶靠泊安排，将同一联盟班轮公司所经营的近洋支线和远洋干线的船舶集中靠泊在洋山港区，以便开展中转业务，减少外高桥港区和小洋山港区之间的调拨数量，降低国际集装箱中转成本。加快洋山北侧陆域码头泊位建设，以便尽早将外高桥港区的部分近洋航线转移到洋山北侧码头。争取到2025年，上海港集装箱吞吐能力能够超过5000万TEU。

积极研究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大洋山港区建设方案，对标新加坡大士港2035年吞吐能力达6500万TEU的发展规划，建设一个吞吐能力超2000万TEU的大洋山港区，同时通过东海公铁两用桥开展海铁联运，力争在2035年将该桥建成投产，使上海港集装箱总吞吐能力增加至7000万TEU，继续保持全球第一大集装箱港的地位，并具备开展江海联运、海铁联运和国际中转业务的能力。唯有如此，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才能在群雄环视中立于不败之地，真正成为全球型国际集装箱中转枢纽。一是港口资源集聚的制度创新，积极推动大洋山港区建设，提升外高桥地区产业能级。二是船员资源集聚的制度创新，在自贸试验区内积极开展船员管理、船员培训等业务。三是集装箱资源集聚的制度创新，推进大洋山港区和公铁两用桥建设，并在临港新片区建设海铁联运服务综合体，推进上海港尽快形成海铁联运的高效集疏运体系。四是航运金融保险资源集聚的制度创新，在自贸试验区内推进更加便利的船舶融资方式，探索人民币融资与造船业务。五是航运高端人才资源集聚的制度创新，促进自贸试验区内人员流动自由和企业用工自由。

(七) 完善与国际接轨的规则建设，建设世界级人才集聚高地

完善与国际接轨的规则建设，营造创新文化氛围。一是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人才个税制度。与中国香港、纽约等国际金融中心相比，目前上海个人所得税率偏高，难以吸引国际化高端人才。要建设以薪酬水平为主要评估指标、以市场为导向的人才机制。二是完善创新环境。鼓励国际科学中心在上海设立分支机构，吸引更多国际知名大学设立上海分校。三是对标国际标准，建设金融信息和数据大平台。完善金融资产定价机制，打造规模最大、种类最全、交易最活跃的数据交易中心。提升金融市场效率，健全金融资产定价机制。四是加强国际金融中心的动能建设，提高上海金融市场的抗风险能力。以科创板注册制改革试点为切入口，做强上海资本市场功能；以全球人民币产品市场建设为抓手，加快上海金融市场开放步伐；以探索“监管沙盒”为抓手，促进上海金融科技发展；以法制信用建设为抓手，优化上海金融发展的生态环境。

建设世界级人才集聚高地，吸引全球人才。一是强化智慧城市建设，完善城市生活便利度。进一步完善户籍与人才政策，打造全世界人才最向往的创业和生活城市；针对高端产业人才，实行更加开放的停居留政策，打造人才集聚高地。二是对外籍

高层次人才工作许可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放宽外籍专业技术技能人才停居留政策。三是建立健全人才服务管理制度。实现工作许可、签证和居留信息共享和联审联检；推进建立人才服务中心，提供工作就业、教育生活服务，保障人才的合法权益。四是实施更加便利的出入境管理政策。逐步实施更大范围适用免签入境政策，逐渐延长免签停留时间；优化出入境边防检查管理，为商务人员、邮轮游艇提供出入境通关便利。

参考文献

- [1] 王阳. 世界经济中心城市成长的必要条件——以纽约和上海为例[J]. 现代商贸工业, 2014(1):86-87.
- [2] 潘辉. 国际贸易中心与国际金融中心互动关系的实证研究——兼论上海两个中心建设[J]. 亚太经济, 2014(6):39-43.
- [3]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17年)[EB/OL]. <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1804/P020170713408029202449.pdf>.
- [4] 邱学. 浅析互联网直播行业的“马太效应”——以斗鱼直播为例[J]. 新闻论坛, 2021, 35(4):82-84.
- [5] 刘泽. 互联网行业的马太效应与应对策略研究[J]. 金融理论与教学, 2014(6):80-82.
- [6] 谢坚钢, 李琪. 以人民城市重要理念为指导推进新时代城市建设和治理现代化——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杨浦滨江讲话精神[J]. 党政论坛, 2020(7):4-6.
- [7] 刘士林. 人民城市：理论渊源和当代发展[J]. 南京社会科学, 2020(8):66-72.
- [8] 张娟. 进口博览会视角下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的内涵和路径[J]. 国际贸易, 2019(5):38-46.
- [9] 王鑫彤. 上海经济中心地位的形成与确立[J]. 西部皮革, 2015, 37(17):50-51, 54.
- [10] 陈建军, 姚先国. 上海建设国际经济中心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产业经济关系研究——以浙沪经济关系为例[J]. 管理世界, 2003(5):44-51.
- [11] 傅尔基. 增强上海国际经济中心综合实力[N]. 联合时报, 2018-10-12.
- [12] 任新建. 破解发展空间瓶颈, 提高上海经济密度研究[J]. 科学发展, 2019(5):86-91.
- [13] 郑永年. 中国第三次开放需要规则制定权[J]. 特区经济, 2021(12):33-34.